



特別訪談 長老釋如典和尚

紀念世界佛教僧伽會成立六十週年（1966–2026）

訪談日期：2026年8月17日

釋原藏法師
世界佛教僧伽會弘法委員會委員

前言：

披上如來法衣六十餘載，德高望重的釋如典長老和尚將畢生奉獻於修學、教育、弘法、經典翻譯，以及奠定海外越南佛教發展的根基。從越南廣南故鄉

的一位子弟，於1964年在會安福林祖庭出家；其後因緣具足，赴日本留學；自1977年起駐錫德國，並與佛教徒大眾一步一步創建漢諾威圓覺寺。後來，圓覺寺逐漸成為歐洲具有代表性的越南佛教與文化中心之一。

長老不僅長期參與歐洲越南統一佛教教會的創立與發展，更傾注大量心力於弘揚佛法、佛教教育及經典翻譯事業。長老著述與譯作豐富，涉及多種語言；目前肩負中央翻譯委員會主席之重任，同時多年來積極參與國際佛教事務，並受禮請擔任世界佛教僧伽會（World Buddhist Sangha Council）副主席。

值此世界佛教僧伽會成立六十週年（1966–2026）之際，《弘法網站》、《廣德網站》與《圓覺網站》謹此隆重進行對釋如典長老和尚的特別訪談，與長老一同回顧一生修學與奉獻的重要歷程：從越南故鄉到日本、德國及歐洲；從最初創立圓覺念佛堂，到今日的圓覺寺；從弘揚佛法、培養僧才、翻譯經典，乃至參與聯繫世界各地僧伽的佛教事業。

我們所希望聆聽的，不僅僅是長老一生所經歷的種種事件；更重要的是，希望聆聽這些事件背後的種種因緣、在異國他鄉弘法道路上的艱辛，以及六十餘年出家生涯所凝聚而成的寶貴經驗，並了解長老對於越南佛教未來及世界僧伽前景的關懷與心願。

謹代表《弘法網站》、《圓覺網站》及《廣德網站》的廣大讀者，至誠感恩長老慈悲歡喜撥冗接受此次特別訪談，並敬請諸位讀者一同聆聽長老的分享。

I／出家、修學與人生最初的足跡

1／釋 原 藏 法

師：敬白長老！1964年，當您年紀尚輕之時，便已在會安福林祖庭出家。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緣，使一位出生於廣南故鄉的少年作出出家的決定？而在最初進入寺院生活的那些歲月裡，哪一些景象至今仍最深刻地留存在您的記憶之中？

釋如典長老和尚：首先，我要非常感謝釋原藏上座。上座過去曾想到，對那些仍然住世的佛門尊宿進行訪談，這確實是非常必要而有意義的事情；如今

也輪到我，承蒙上座想到並提出訪談。因此，我願以自己最真誠的心，回答上座所提出的問題，與《廣德網站》、《弘法網站》和《圓覺網站》的讀者分享。

我於1949年出生在廣南省維川縣川美鄉美鶴村的一個中農家庭。我的父親是黎涓老先生，法名是濟，皈依於會安福林祖庭住持釋如萬和尚。父親生於1898年，即十九世紀末，於1986年農曆七月初九逝世，享壽八十九歲。我出生於二十世紀上半葉即將結束之時，也就是1949年，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家中共有五個兒子和三個女兒。我的母親名叫胡氏巧，法名是色，生於1908年，於1966年3月27日因戰爭而去世。當時，我已經出家兩年。

我的村中有一座寺院，名叫河靈寺；這裡也是河靈佛教家庭（Gia Đình Phật Tử Hà

Linh）活動的地方。正是這個佛教家庭，培養出許多後來發心出家的人，而他們後來已經或正在成為佛門中的和尚、尼長，例如：釋保樂和尚、釋女妙心尼長、釋女妙指尼長、釋女如圓尼長、釋女妙福尼長、釋女妙義尼長等等。

我從1958年開始參加河靈佛教家庭的活動，當時將近十歲。那些歌曲，如《我們是藍衣團》、《有一天，有一天，初一到寺院》、《姐姐帶領弟妹》、《我們是小鳥》等等，在鄉村十五圓月的月光之下，童年最初那些充滿佛教氣息的歌聲，就這樣深深滲入我的心田。

到了1963年，在那一場佛教抗爭運動之後，我的師父——已故釋龍智和尚，當時擔任會安圓覺寺住持——

應護寺委員會禮請前來講經說法。1963年底，我正式皈依於師父座下，師父賜給我的法名是「如典」。這個法名，我一直沿用至今；雖然1967年我在峴港普陀寺受沙彌戒時，師父又賜給我法字「解明」；1971年10月，我在守德廣德寺院受比丘戒，當時已故釋廣蓮和尚擔任院主，本師和尚又賜給我法號「智心」。

那一年的戒壇，由釋智首和尚擔任壇頭和尚，善和和尚擔任羯磨阿闍黎，行柱和尚擔任教授阿闍黎。印光寺的明發法師，當時則在該戒壇受沙彌戒。

釋保樂和尚是我的親哥哥，也曾參加河靈佛教家庭。1957年農曆二月初八，哥哥離家出家；他離開之前留下了幾封信，家人讀過之後，心中留下了不知多少思念。那時候，我自己還完全沒有想到日後也會出家；然而，漸漸地，經過幾次前往峴港山水寺參訪——當時該寺由已故釋智友和尚住持——我逐漸感受到禪門的氣息，因此在1960年便萌生了出家的心願。

然而，我當時尚未完成小學學業，所以還不敢向父母稟告。一直到1961年夏天小學畢業之後，我才決定請求父母允許我出家；可是父母兩人一直拖延，並告訴我：「你是家中最小的兒子，而且你哥哥已經出家了，為什麼還要再有一個孩子去出家呢？」

我保持沉默，等待因緣成熟。一直到1964年初，我再次提出請求，而且這一次決心非常堅定：「如果父母不讓我去，我就像七哥（保樂法師）一樣，離家出走。」

過了幾個星期，父母兩人不知道商量了些什麼，後來父親對我說：「如果你去請求母親，而她同意，那麼父親就答應。」可是當我去請求母親時，母親又說：「如果你父親同意，那麼母親就答應。」

於是，我心裡明白：這盤棋已經有路可走了。我開始準備一個小沙彌出家所需要的一切行裝，雖然當時甚至還沒有先到會安，向自己的本師稟告。

我選擇離家的日子，是1964年農曆五月十五日。那一天正好是祖父的忌日，所有哥哥姐姐都回到父母家中。當時還有兩位姐夫和一位嫂嫂在場，至於侄兒侄女們，那時候年紀都還很小。

祖父的忌辰祭拜結束之後，我上前禮佛，向家人辭別，在炎熱的盛夏中離開了家。家裡所有的人都哭了，雙眼一直望著我離去；而我卻微笑著，因為我覺得自己終於戰勝了自己。於是，我騎上自行車，一路直奔會安圓覺寺，向師父稟告。

師父並沒有感到驚訝，只告訴我：「我要去西貢治病。你拿著這封信，到福林祖庭去見如萬法師——祖庭住持——把信呈給他，並向他說明你的願望。等我從西貢回到寺裡以後，我會派人叫你回圓覺寺，為你剃度。」

隨後，師父送給我一套非常寬大的越南傳統長衫，我一直把它保存到1969年進入西貢之時。

甲辰年（1964）六月十九日，我被叫回圓覺寺。我的師父——已故釋龍智和尚——

正式為我剃髮出家；就在同一天，我又騎著自行車回到福林祖庭，繼續隨大眾修學。當時寺中還有行秋法師、行德法師、行真法師等等。至此，種種因緣具足，使我於1964年在廣南會安這兩座祖庭——圓覺寺與福林祖庭——正式出家。

2／釋 原 藏 法

師：您的本師是已故釋龍智和尚，也是當年「廣南四柱」之一。在您一生的修學道路上，從本師那裡承受、繼承下來最重要的是什麼？

釋如典長老和尚：我的師父出生於會安明鄉村的名門望族。他的父親曾經擔任會安市的里長；他的親哥哥是國會議員李長珍，屬於阮文紹第二共和國時期眾議院的反對派陣營。因此，師父天資聰穎、反應敏捷；無論做什麼事情都非常果斷、堅決，從不因任何權貴而有所顧忌，即使在佛教內部也是如此。因此，師父一生中也有很多人不喜歡他。

當年的「廣南四柱」分別是：已故釋真發和尚，龍泉祖庭住持；已故釋如萬和尚，福林祖庭住持；已故釋如慧和尚，廣南省佛教會寺住持，後來該寺改名為法寶寺；以及我的師父——圓覺祖庭住持釋龍智和尚。

1966年夏天，我請求釋如萬和尚允許我回圓覺寺修行。因為當時正值青春年少，寺院裡發生的一些不愉快事情對我造成了影響，所以我請求離開福林祖庭。

然而，回到圓覺寺也沒有因此得到安寧，因為那一年釋智光和尚發出了「佛桌走上街頭」的號召。當時中部地區幾乎所有寺院的僧人都遭到逮捕入獄。我的師父和我，也同樣經歷了三個月的牢獄生活。師父被拘禁在西貢，而我則被關押在廣南國家警察署。

1966年3月27日，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整整哭了一天。因為那一天，我得知自己的母親和伯母，在所謂「糯米豆地區」——即雙方勢力交錯地區——遭到國家軍隊的農用飛機攻擊，當時軍方正在該地區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部隊作戰。

一直到現在，我已經接近八十歲，在寺院生活超過六十二年，也曾到各地從事佛事，但我從來沒有再像那一次那樣哭過；也許一直到棺木蓋上的那一刻，我都不會再哭。我也從來不曾因為成功完成某一項計畫，而感到無比得意，甚至躲在暗處大笑。因為我明白，哭也好，笑也好，都只不過是人生世界中相對待的現象而已。

我也從來不會太過以自己為榮。因為我想到，有時候生長在路旁的花草，也依然會開出美麗的花朵，展現鮮豔的色彩，把美麗與芬芳奉獻給這個世界。那麼，我自己又有什麼值得得意歡喜的呢？

此外，我的母親原本並不識字，而父親卻非常熟悉漢文。母親沒有教導我們兄弟姐妹什麼高深的大道理，但是她自己的一生，卻成為我們終身必須學習的一面明鏡。她教給我們的就是：對上，要懂得敬重長輩；對下，要懂得謙讓比自己年幼的人。

僅僅這些教誨，我卻帶著走過了整整一生，並運用在自己的生活之中。因此，無論遇到什麼事情，最後往往都能隨順因緣而過；幾乎沒有什麼逆境能夠使我退縮。這一切，都得益於師父堅強的意志，以及一位樸實鄉村母親所展現的犧牲與堪忍精神。

我從本師身上學到了許多非常優越的品德。師父也從來沒有在人前稱讚過我，雖然他明明知道，我曾是在會安菩提中學1965-1966、1966-1967及1967-1968幾個學年度中最優秀、最模範的學生之一。在此以前，即1964-1965學年度，我在私立延洪中學讀七年級，當時與釋解重和尚、釋如品和尚等人同學。

1968年第四年級學年結束時，我一共獲得三個獎項：第一，全班第一名獎；第二，在全校約九百名學生中，獲得全校學業成績最佳獎；第三，獲得品行優良、勤奮學習、全年沒有缺課一天獎。當時，已故釋如慧和尚擔任會安菩提中學教務主任。

憑著這三個獎項，我獲准轉入陳貴恰公立中學繼續就讀第三年級。當時一共有五名學生獲准轉校，分別進入A、B、C不同組別。他們是：釋如品和尚——現任會安龍泉祖庭住持；楊許元——現在是醫生，居住於西貢；馮仁——已於戰爭中去世；阮氏秋香——現在是藥劑師；以及我本人。

讀完陳貴恰中學第三年級A班以後，當時宋勸先生擔任校長，我離開會安圓覺寺，進入西貢，住在堤岸明命路的興隆寺，繼續在范文運教授創辦的共和學校就讀第二年級，時間是1969–1970學年度。

1970–

1971學年度，在取得完整高中畢業文憑以後，我開始準備前往日本留學。原因當然很多，但歸根結底，只是因為我希望到另一片新的天地，尋找並探索自己過去從未見過的新事物。

在我住在圓覺寺和福林祖庭期間，**每年**夏天，諸位法師都允許我前往龍泉祖庭。當時龍泉祖庭由釋真發和尚住持，我在那裡用三個月時間學習經、律、論。因此，我的漢文和佛教教理，也從那個時候開始逐漸深入；與此同時，我仍繼續學習世間學校的課程。

3／釋 原 藏 法

師：您一方面學習佛學，一方面又研習世間學問；在赴日本留學以前，您曾是一位成績優異的學生。依您的經驗，對一位出家人而言，戒、定、慧、佛學與世學之間，應當如何相互輔助？

釋如典長老和尚：這件事情對我們出家人而言也相當重要。因此，我曾在自己的《法語》一書中說過：「學問並不能使我們獲得覺悟與解脫；但是，如果想要打開那一扇解脫之門，卻不能缺少修行與學習。」

後來年紀漸長，我閱讀了很多書籍、經典和雜誌。其實，小時候的我非常懶於讀書；所以1961年小學畢業時——當時我還沒有出家——我的成績幾乎排在全班最後。從那以後，我才明白，任何成功都需要自己努力，並不是成果自然就會出現。

法國人有一句話：「Aide-toi, le ciel t'aidera」，字面的意思就是：「先幫助自己，上天才會幫助你。」也就是說，自己先努力，才可能得到別人的幫助。越南人也常說：「有磨鐵杵之功，終有成針之日。」人們又常說，天才只有百分之一來自天賦，其餘百分之九十九則來自汗水、意志與努力。我自己就屬於那百分之九十九。

我們學習佛教的緣起學說，都知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滅故彼滅。」一切都是重重緣起、重重變現的一連串因緣。我們有幸得生為人，又有機會成為佛教徒，尤其還能出家學道。從這個層面來看，佛法與世間彼此相即，形成一連串不可思議的因緣，使我們得以實踐戒、定、慧。

4／釋 原 藏 法 師：

1972年，您以一份十分微薄的獎學金前往日本，先學習日語，之後進入帝京大學教育學系，並繼續攻讀佛教研究所。那段在日本的歲月，後來對您的思想、學習方法以及弘法方向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釋如典長老和尚：談到日本，對我個人而言，我一輩子都要向日本人脫帽致敬。因為日本人對自己、對社會的責任感非常高。他們幾乎從不對人失信，非常守時、清潔、整齊、沉著，而且總是不斷自我完善，不必等待別人提醒。例如排隊，即使是排隊上洗手間，他們也從來不爭先恐後；不說粗話，不自我吹捧、貶低別人，也不談論身旁之人的壞話等等。

光是日本人的這些品德，我們即使學習並實踐一輩子，也未必能夠全部做到。因此，每當有機會回到日本，在各種會議或日本許多大學的學生面前，我常常表達自己的看法：

「我要感謝你們的日本。因為如果沒有日本人民從1972年至1977年給我的那一碗飯、那一口水，收留並照顧我，就不會有今天的我。」

1972年，按照原來的安排，我應該在四谷日本語學校讀一年，之後才能參加入學考試進入大學；可是我跳級了。也就是說，第一期學習三個月後，我的考試成績超過九十分，因此直接升到第三期，跳過第二期。第三期結束時，我又考到九十分以上，所以再次跳過第四期，直接進入第五期。因此，原本應該學五期的課程，我只用了九個月，完成三期就結束了。

藉著上座提出這個問題的因緣，我也想在此感恩當年與我赴日本留學因緣有關、如今仍然健在，以及已經辭世的諸位恩人。

第一位就是我的本師；其次是釋一行和尚。1975年以後直到1977年，在我離開日本前往德國之前，釋一行和尚曾經提供獎學金幫助我。

再下一位是我的師兄——

釋保樂和尚。當時，他正在西貢黃金菩提學校任教，並介紹我認識林如藏法師，由林如藏法師協助我辦理前往日本所需要的文件和手續。林如藏法師後來在東京明治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目前定居澳洲。

我抵達日本時，第一位接待我的，是釋真成長老和尚。現在長老住在美國，今年已經九十三歲。

接下來是已故釋明心和尚。當我考入帝京大學教育學系以後，身上的錢已經用盡，所以我請釋明心和尚幫忙，讓我借住在東京附近八王子的日本寺院本立寺（Honryuji）。

由於這一份恩情，我立即獲得許多利益。首先，我的日語自然而然地進步了。因為每天在寺院裡用日語誦經，用日語交談；到學校又與日本學生一起上課，同樣使用日語。因此，即使離開日本將近五十年（1977–2026），我至今仍能流利使用日語。

此外，我還省下了房租、伙食和衣服等等費用。作為回報，我必須承擔一名在寺院修行的行者應做的工作，因此也經歷了不少辛苦；尤其常常要聽住持及川和尚夫人的冷言冷語。至於及川和尚本人，我必須說，他是一位非常好的人，對我們這些住在他寺院裡的外國人實在好得不能再好了。

1973年冬天的一天，我正在誦經。外面下著雪，天氣非常寒冷；然而寺院的大殿沒有暖氣，而且修行人上大殿誦經或工作時，又不允許穿襪子。因此，我便向和尚稟告：

「寺外和寺內都這麼寒冷，可是寺院沒有暖氣，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和尚笑著回答：

「你們把經念大聲一點，就不冷了。」

這句話的意思是，日本人自古以來就是如此忍受艱苦、克服困難；那麼外國人也應當如此。

另一次，我還保留著越南人的習慣，看見寺院明明還很乾淨，心裡便想：為什麼**每天**還要打掃兩次？於是我去問和尚，和尚教導我說：

「修行人連寺院都擦不乾淨，又怎麼能把自己的心擦乾淨呢？」

聽完以後，我低下頭，默默走向客廳，繼續自己的清掃工作。

這些都只是平常的小事。至於接待客人、誦經、講法、旅行等等，還有幾十件事情可以在這裡講述。不過最後我仍然只有一句話：我要低頭感念上述所有恩人，以及其他沒有具名的人，包括朋友和同鄉，如潘德利、阮通等等。

5／釋 原 藏 法 師：

回顧從會安的一名小沙彌，到一位赴日本求學的越南僧人，後來又在德國弘法；究竟哪一個轉折點，最重要地改變了您一生的方向？

釋如典長老和尚：確實如此！今天，在寺院生活超過六十二年、在人世間走過將近八十載之後，坐下來回想，我甚至覺得那好像已經不是自己了。我所完成的一切，似乎都是三寶預先安排的，並不是我自己所主張、計畫出來的。

很明顯，出家這條路確實是我自己想到的；但是，當我十五歲剛剛成為廣南會安福林祖庭與圓覺祖庭的一名小沙彌時，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必須去讀書，然後取得這個學位、那個學位。我也沒有想過，為什麼自己能夠有這麼長久的記憶力，又能說這麼多種語言，而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卻沒有。

我出生在農村，本來應該手拿犁耙、鋤頭，從事農耕；可是我卻拿錯了毛筆和墨水筆。如果我種樹，往往不會結果；可是我「種人」，卻能開花。這些都是多生多世的因緣與果報，並不是由我自己創造出來的。

從前我出家時，村裡幾位老太太彼此說：「黎涓先生家裡有兩個兒子『出洋』了。」其實她們應該說「出家」才對。可是到了1972年，我真的「出洋」了，也就是越洋前往日本留學。1974年，釋保樂和尚也前往日本，繼續走上勤奮求學、鑽研經史的道路。

1977年4月，我持旅遊簽證前往德國時，原本一直以為三個月後就會返回日本，完成自己在東京立正大學的佛教研究所課程。然而並非如此。我一去便久久沒有回去，到今天離開日本已經將近五十年，而東京的研究所課程也沒有完整完成。

來到德國之後，一片新的天地又在眼前展開。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建立寺院、剃度出家弟子以及攝受在家信眾；更從來沒有想到，有一天自己竟然會走訪世界八十五個國家並弘揚佛法。一個鄉下人，怎麼敢想像這些事情呢？

到了德國，我接觸到一個全新的環境。德語與英語、法語或日語相比，實在困難得多。然而，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竟然也就這樣融入了。

雖然我在1974年從日本回越南探親一個月時，已經取得汽車駕駛執照，但是我只在日本開過兩次車，此後就再也沒有開車。從那時直到今天，我從來沒有再握過方向盤。因此，很多人說，我出生在這個世界上，似乎只是為了接收德國政府以及各地佛教徒帶來的好消息，而很少受到逆境的干擾。

這種說法也不算太錯；可是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得到這樣的因緣。也許是因為從1984年至2024年，整整四十個結夏安居期間，**每年**三個月，我

都逐字禮拜經典，包括《五百名》、《三千佛名》、《萬佛經》、《法華經》、《大般涅槃經》等等。

因為**每**一個字都禮拜，所以佛陀的教誨便一天天滲入內心，而自己甚至沒有察覺。或許也因為從剛出家一直到今天，每天清晨都精勤不懈地修持《楞嚴經》，所以才有後來這些結果吧？

II／德國、歐洲越南佛教與圓覺寺

6／釋 原 藏 法 師：

依照您的生平資料，您於1977年4月22日抵達德國。當時，德國的越南人社群還非常小，弘法條件想必也極為艱難。您最初踏上德國土地的那些日子，是如何度過的？

釋如典長老和尚：我只是一名剛從日本大學畢業的學生，帶著一點知識來到德國，事先並沒有做太多準備；然而，各種因緣卻接二連三地到來，而且相當多。在《故寺稻香》一書中——這本書由我和釋保樂和尚共同撰寫——我們兄弟二人一生中的主要事情，幾乎都已經相當完整地介紹過了。

必須說，我對施明文公簪醫師有著很深的感恩。簪既是我在川美讀小學時的同學，也是我的恩人，又是我的弟子。如今，尼長和公簪醫師都已經永遠離開人世了。

1977年夏天，我還在基爾的Volkshochschule學習德語。那些在1975年以前、越南共和國時期就已經到德國留學的學生朋友，週末時常常相約一起踢足球；櫻桃（Kirschen）成熟的季節，也會一起去摘櫻桃，生活也非常快樂。

有時候錢用完了——

或者更準確地說，必須把錢節省下來，以支付每個月的房租和伙食。那時候，公簪醫師還是一名醫學院學生，也住在基爾Holtenauer街同一座學生宿舍。有一次，在1977年冬天，她碰巧看見我學完德語騎自行車回來。天氣非常寒冷；我的雙手沒有戴手套，而是套著兩個塑膠袋，然後騎自行車去上課。

後來，公簪醫師把這段回憶寫成一篇文章，題為：《兩個塑膠袋成就異國佛教事業》，感動了許多人。

可是當時，我從來沒有抱怨生活辛苦，也從來沒有埋怨自己缺少什麼。況且，那時候意志非常堅強，年紀還不到三十歲，對未來仍然充滿熱忱，或許因為前面的道路還很漫長吧？如果換成現在，已經接近八十歲，我大概不敢再想像自己還能做那些事情了。

1978年2月，我前往漢諾威，繼續攻讀教育學研究所課程；並於1978年4月佛誕期間成立圓覺念佛堂，由已故釋明心和尚證明。

那個時候，越南僑胞還非常少，只有幾位學生聚集在一起，例如林登洲、吳玉葉、阮玉俊、阮氏菊等等。白天我到大學上課，晚上回來誦經、念佛。就是這麼簡單。

到了1978年12月底，在當時下薩克森州州長Dr. Albrecht的支持之下——他也是現任歐盟執委會主席Ursula von der Leyen醫師的父親——他推動德意志聯邦政府接收兩艘「海虹號」船上漂泊於香港海面的二千名越南華裔難民，並將他們安置於哥廷根附近的Friedland臨時難民營。於是，我便有機會為這些新抵達的難民擔任翻譯，從越南語翻成德語，又從德語翻回越南語；雖然當時我學德語才一年多而已。

這也如同1975年，原越南國寺東方大學校長黎金銀教授一行抵達日本避難時，我與一些在日本的越南學生也曾前往東京難民營，協助日語與越南語之間的雙向翻譯。1975年以後抵達日本的越南人，大部分都希望前往澳洲、美國或加拿大定居，很少有人願意留在日本，因為當時日本政府尚未建立聯合國所倡議的難民援助計畫。而後來的一切，也正是從這些因緣開始的。

7／釋原藏上座：

僅僅一年之後，也就是1978年4月，您便在漢諾威成立了圓覺念佛堂。究竟是什麼原因，使您在當時一個陌生的西方國家，決定建立一個越南佛教道場？

釋如典長老和尚：

很明顯，當時我根本沒有任何建寺的計畫，只想繼續學業，並以宗教理由申請政治庇護而已。但是如前面所說，當越南難民來到下薩克森州時，婚喪喜慶、祭祀等各種事情都需要一位出家法師，而當時在這裡唯一的越南僧人就是我。

至於德國僧人，當時我還沒有機會接觸，除了德國佛教聯合會（Deutsche Buddhistische Union）之外；當時漢諾威也有一個分會。我便運用自己才學了一年多的德語，加上英語，與他們接觸，向他們說明我預計推動的一些工作。

透過電視和報紙，人們知道有一位越南僧人正在哥廷根醫院協助擔任翻譯員，那個地方就在今天圓覺寺附近。後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內政部也注意到這項工作，並正式來函，邀請我們前往波恩。當時德國自1949年起分裂為東德與西德，而波恩正是西德的臨時首都。

因此，從1979年至2004年，整整二十五年間，我們都獲得德國政府相當可觀的資助，用於文化及宗教活動。這些活動由我、越南學生與僑胞佛教徒協會，以及越南統一佛教教會德國支部共同推動。

正因為有這些順緣，圓覺寺的基礎逐步建立起來。最初我們在Kestnerstraße，之後搬到Eichelkampstraße的一處租賃場所。德國政府也連續十年補助房租、電費、瓦斯費和水費。

到了1991年，我們正式搬進新建成的寺院，德國政府則轉而協助印刷我撰寫的書籍，以及出版《圓覺》雜誌等等。說實在的，這些事情彷彿都是從某個地方自然送到面前，連我自己也沒有料想到。

如果當時我向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內政部的Dr.

Geissler提出，希望在漢諾威為越南反共難民興建一座寺院，我想他們大概也會答應。但當時我根本沒有想到這件事，因為每個月、每一年，德國政府對寺院的幫助已經太多了。

有時候，慈悲之門對於一些並非真正必要的需求，也應該適度關閉；而對於過度的祈求之門，是否也應當關上一點呢？不過事實上，當時的我根本沒有想到這一層。

8／釋 原 藏 法

師：從1978年一個小小的念佛堂開始，圓覺寺於1989年動工，1993年完工，後來成為歐洲重要的越南佛教與文化中心之一。在這段歷程中，哪一個階段最艱難？哪一段回憶最令您感動？

釋如典長老和尚：那個時候，我本來沒有建寺的念頭；但是牙醫蘇永和先生、建築師陳風流先生、阮氏幸博士等人一直催促我推動這件事。然而當時寺院幾乎沒有什麼積蓄，除了剛到德國申請難民身分的佛教徒所供養的一些微薄款項之外；至於1975年以前來德國留學的學生朋友，當時才剛畢業，所以大家出力有餘，但經濟能力仍然很有限。

於是這個人出一個主意，那個人又提出另一個辦法。因此，我不能只是坐著等待，只好開始替建築師尋找土地。

當時我們希望購買大約四千平方公尺的土地，可是錢從哪裡來呢？阮氏幸博士便建議說：「師父可以把土地分成一平方公尺一份，讓每位佛教徒、每個家庭供養一平方公尺或數平方公尺。」

當時每平方公尺價值135德國馬克。於是，大約三至四個月之後，我們就籌足了款項，買下四千平方公尺的土地，就在Beton Union公司的馬路對面。

建築師陳風流先生開始設計寺院，我們也著手辦理建築許可。最初估計工程費約三百萬德國馬克，但經過四年建設（1989–1993），總費用最後達到九百萬德國馬克，相當於當時大約五百萬美元。

後來很多人問我：「錢從哪裡來？師父怎麼想到這樣的募款計畫？」

我回答說：

「錢是從鐘和木魚來的。只要鐘木魚敲得規律，護法善神就會召喚有心人，把淨財帶到寺院來供養。我建這座寺，是先用心來建，而不是先從錢開始。」

正因為佛教徒有一顆想建寺的心，所以我才開始行動。而且，我所有建寺募款的方法，都學自釋明心和尚，例如建寺供養、無息善會、一磚建寺、一瓦蓋寺等等。就這樣，一切事情逐漸圓滿成就。

歡喜的事情有，憂心的事情也有；但是外出募款時感到羞恥，大概從來沒有。

例如，我們曾進入日本商店募款，鞠躬鞠到脖子都酸了；可是當把募款簿遞出去時，對方只寫下「1德國馬克」的供養。

有一次，我們師徒走進一家華人餐廳募款，老闆說：「我不信佛，也不信上帝，我只相信錢。」

我們向他鞠躬，然後離開。其實也覺得很好笑。

不知道那位老闆現在是否還活著；如果已經去世，不知道他究竟帶走了什麼？或許最後仍然只是兩手空空吧？

有一天，我們到一些泰國餐廳去募款。

他們非常熱情，不只是老闆一個人供養，還把所有員工都叫來一起隨喜，共同供養；除此之外，還把附近其他泰國人工作的地址告訴我們，讓我們繼續前往募款。

不知道怎麼走的，我們竟然誤闖進了風月場所，那裡有一些女子以賣身維生。

我在汽車裡等了相當長的時間，而行玉師姑和行如師姑則走上樓去募款建寺。

當時我心裡還想：萬一有越南人剛好從這裡經過，看見我坐在汽車裡，停在這種風月場所前面，再拍下一張照片，他們就有理由說：「如典法師行為不端。」

可是他們哪裡知道，我其實是在等兩位師姑回來。

當時我對能募得多少供養已經沒有太大期待，反而只是覺得，在這裡坐上一個多小時實在有些不自在。

後來兩位師姑回到車裡，把那些靠賣身維生的泰國女子所供養的建寺款交給我。

在記錄她們隨喜金額的紙頁上，還留著一些口紅的痕跡……

我當時非常感動，也對所有人充滿感恩，其中也包括那一天的那些泰國女子。

現在，漢諾威政府似乎已經把那個區域整頓掉了；而兩位師姑也都在幾年前往生了。

不知道將來她們見到佛與諸位菩薩，如果佛菩薩問起這件事，她們會怎樣講述當年的這一段故事呢？

9／釋 原 藏 法 師：

圓覺寺不僅服務越南人，也有許多德國人前來學佛、禪修及研究佛法。依您之見，如果要把佛法弘傳到西方社會，哪些內容必須原原本本地保存？哪些方面又應該善巧方便，以適應當地文化？

釋如典長老和尚：釋一行和尚透過正念禪修，以西方人容易理解的語言向他們說法，在西方弘法非常成功；而我與他稍微有些不同。

我的觀念是：

「紙雖破了，邊仍然要留住。」

我們大多數屬於大乘佛教傳統，以念佛法門為主。因此，即使為了適應新的環境而現代化，我仍然認為自己的根本一定要保留下來。

德國人來學佛時，我仍然先教他們依數息觀的方法坐禪；稍微熟練以後，再開始教他們念佛與誦經。

我們偶爾也用德語開設《藥師經》、《阿彌陀經》、《法華經》的研習課程，每週一至兩次。

後來，我忙於各地佛事，便把這項工作交給諸位住持法師，例如行晉法師、行戒法師、行本法師、行定法師等等。

此外，幾十年來，我也請是真吳玉葉與善心Hugo負責德國中學生、大學生的佛學課程。

因此，德國人對佛教的了解逐漸深入。最明顯的證明就是，他們已經懂得念佛、坐禪，也能以自己的母語研究佛教經典。

1977年我來到德國時，越南佛教在這裡幾乎還沒有任何正式的活動場所。

1978年，圓覺念佛堂在漢諾威成立。

今天，將近五十年過去，整個德國已經有大約三十座越南佛寺，並有許多僧尼、佛教徒以及佛教家庭組織共同依六和精神生活與活動。

回顧這一段道路，就可以看到越南佛教在德國確實已經走過相當漫長的一段歷程。

圓覺寺始終是一座依傳統而建立的寺院，基本修學生活與東亞寺院沒有太大差別。

但是，因為寺院坐落在德國——一個擁有悠久文化與宗教傳統的國家——所以我們也必須懂得適應與提升，使寺院具備適合歐洲修學、宗教及心靈中心的各種條件與活動。

圓覺寺也參與德國的宗教交流、宗教和諧等活動，藉此分享覺醒的生活方式、社區和諧精神，以及保護自然環境的意識。

《圓覺雜誌》（Viên Giác Magazin）也是一種弘法方便。

這份雜誌已經定期、連續出版將近五十年。

除了傳播佛陀教法之外，雜誌也有助於海外越南人的下一代保存越南語與越南文化。

這也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弘法方式。

我還記得，1977年想買一塊豆腐，都必須從漢諾威走大約一百五十公里到漢堡才能買到。

現在將近五十年後，根據德國食品業的統計，已有約三百萬德國人完全素食，另有大約三至四百萬人不食用肉類和魚類。

當然，這些人並不全都是佛教徒；但是，不殺生、保護環境、親近自然以及佛教慈悲精神等觀念，在西方社會已經越來越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所以依我之見，必須保持不變的，是修學的根本、**每天**的經課功夫，以及我們自己的傳統。

需要善巧方便調整的，是表達方式、語言和接近眾人的方法，使佛法能夠自然地進入德國人的心中。

最重要的仍然是佛教的和諧、友善、慈悲與智慧。

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真正熟悉當地語言，而德語又恰恰是世界上最難學的語言之一。

10／釋 原 藏 法 師：

經過將近半個世紀在德國弘法，您如何看待歐洲越南佛教社群的變化？從第一代越南難民，到在西方出生與成長的第二代、第三代，他們之間有什麼不同？

釋如典長老和尚：第一代越南難民，是為第二代犧牲的一代。

如果第一代在越南時已經受過高等教育，例如醫師、工程師，又熟悉英語、法語、德語等外語，那麼他們來到海外後，仍然可以重新註冊，繼續從事自己的專業；而且在海外獲得成功的人也相當不少。

如果沒有這些條件，他們就必須從事勞力工作，以維持日常生活，並撫養在這裡出生、長大的第二代。

第二代非常熟悉當地語言；但是對於越南語這個母語，大多數只會說，真正能讀、能寫的並不多。

這一代在學校教育以及今天西方社會的許多領域都非常成功。

從一些博士論文、碩士論文對相關主題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有不少很有價值的學術成果。

但是到了第三代，問題就變得比較大了。

當他們的父母已經在人生許多領域取得成功，第三代有時便容易依賴父母的成就。

其中一些人不再繼續高等教育，而選擇學習職業技能，希望較早開始賺錢；而對他們來說，母語則變得更加陌生。

幸而依靠德國的越南佛教家庭，以及世界各地越南佛教家庭的各種活動，我們還能在異國他鄉保留一部分越南故鄉的形象。

到了第四代，情況肯定又會更加不同。

我只希望未來的世代能夠自己主動去了解自己的根源；這樣可能比我們強迫他們，更容易，也更持久。

例如，李龍祥皇子因當時政治環境，率領一批人離開大越。

七百多年後的今天，仍然有李氏後裔尋回越南民族的根源。

這是一個真實存在的證明。

又如歷史上的阮映——後來的嘉隆皇帝——在與西山朝交戰的時期，曾經逃往暹羅避難。

那些越南人社群在海外形成之後，即使經過很多代，仍然有可能重新尋回自己的根源。

因此，我們實在沒有什麼理由感到失望。

III／弘法、教育與翻譯三藏

11／釋 原 藏 法 師：

從2004年至2019年，整整十五年間，您曾帶領弘法團前往歐洲、美國、加拿大以及其他洲的許多國家。

經過這些弘法行程，您認為海外越南佛教徒對佛法的需求，與越南國內佛教徒有什麼不同？

釋如典長老和尚：

在越南，無論1975年以前或以後，幾乎**每**一個村莊都有一座寺院，而且**每**一座寺院通常都有法師或師姑常住，協助處理婚喪、祭祀等各種事情。

與海外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國內佛教徒隨時都可以到寺院，而且無論走到哪裡，都容易找到寺院禮佛、拜訪僧尼。

而在海外，自1975年至今，第一代移居歐洲、美洲、澳洲的越南人，首先必須自己建立寺院、建設三寶道場；尤其更需要培養信眾對佛法的信心。

因此，各洲逐漸形成各種佛法修學活動。

例如八關齋戒、週末為離鄉佛教徒舉辦的聽法活動，都是非常實際的需求。

因此，我們常常組織歐洲、美洲、澳洲弘法團，到許多地方講經說法，而且都得到當地僧尼與佛教徒非常熱情的支持。

今天，又有Zoom系統以及網路佛學課程（online）等弘法方式。

這些方式都非常值得鼓勵，不僅適用於現在，在未來也同樣具有很大的價值。

12／釋 原 藏 法 師：

您曾在教會中承擔許多重要職務，尤其是在弘法方面。

在今天這個網際網路、社群媒體與人工智慧的時代，從事弘法工作的人應當如何改變方法，同時又能保持正見，以及契理、契機的精神？

釋如典長老和尚：日本有一句俗語：「*Gō ni ireba, gō ni shitagae* — 郷に入れば郷に従え。」

意思是：「進入一個地方，就應當隨順那個地方。」

與越南語「入家隨俗」的意思相近。

我們閱讀佛經也知道，佛陀度化最初六十位阿羅漢弟子之後，曾勸勉每一位弟子各自前往不同方向，弘傳正法。

這種精神說明，弘法必須懂得依眾生根機、環境、風俗以及各地語言而施設方便教化。

佛門中常有一句話：「弘法為家務，利生為事業。」

意思就是：以弘揚正法作為自己的家務，以利益眾生作為自己的事業。

這句話後來在佛教界廣泛流傳，不應直接標明為佛陀的原話。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也曾多次強調，世界不斷變化，人類必須懂得適應時代的轉變。

他也曾明確指出，如果科學證明佛教的某一項觀念並不正確，那麼佛教就應該改變那項觀念。

如果我們不知道隨環境而調整，就很容易落伍。

所以，弘法永遠都必須契理、契機。

今天，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慧）已經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的重要成就。

因此，在弘法工作中，我們也應當懂得運用符合時代的各種方便，例如網際網路、線上說法（online）、Zoom系統、人工智慧等等，以弘揚正法。

當然，方便法門可以隨時間和環境而改變；但是正法的內容以及利益眾生的目的，始終必須保持。

這正是今天弘法工作中所需要的：

契理、契機與契時。

13／釋 原 藏 法 師：

到2026年為止，您已經完成了75部著作與譯作，使用的語言包括越南語、漢語、日語、英語及德語。究竟是什麼力量，使您在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仍然能保持如此旺盛的工作能力，以及在著述與翻譯事業上的堅持？

釋如典長老和尚：1974年，當我還在東京附近八王子的帝京大學教育學系就讀時，日語老師Takeda曾經建議我，應該選一些優秀的越南語作品翻譯成日語，讓老師以此評估我的日語能力，代替國文課程。

於是，我選擇了阮董之所著的《越南民間故事》，翻譯成日語。大學二年級那一整年，我完成了這項功課，之後便把譯稿帶回寺院，拿給八王子本立寺住持及川和尚看，希望他能替我寫一篇序文，好讓我出版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

到了大學三年級，我又完成了第二部譯作，其中包括一些節譯的內容。

一直到1979年，當我前往巴黎慶英寺，協助釋明心和尚看守寺院時，我開始撰寫《初夏雨滴》一書，並請和尚替我撰寫序文。

從那時開始，**每**一年，我幾乎都會撰寫或翻譯一本書。

特別是在2003年至2012年之間，我有整整十年時間，在澳洲Campbelltown多寶山區，以及雪梨附近Blue Mountains一帶閉關。

在那十年間，**每**一年我都能翻譯或撰寫兩部作品。

到了2026年，我已經完成75部著作與譯作，使用的語言包括越南語、英語、漢語、日語及德語。

其實，我本來也應該翻譯法語，因為法語是我的第一外語。

我在中學第一級與第二級階段，前後學了七年法語。

但是因為已經很久沒有經常使用，所以現在如果要翻譯，必須先重新複習才行。

我就像一隻螞蟻，**每**天只搬一點食物回洞裡儲存。

就這樣，不知不覺已經翻譯、寫作超過五十年，想起來也覺得很奇妙。

因為我做這些事情，從來沒有懷著什麼特別的企求。

別人稱讚也好，批評也罷，都可以。

就像蠶一樣，只要不斷吐絲就好了。

對於教會的義務與責任也是一樣。

沒有人一定要把某項工作交給自己；可是如果自己已經勇敢接受了責任，那麼就應該把它完成。

就像《圓覺》雜誌一樣，上座也知道，第一期是在1979年1月1日出版。

一直到今天，將近半個世紀過去，**每**一年固定出版六期，從來沒有延誤過任何一期。

到現在，已經出版到第274期。

我也不知道《圓覺》什麼時候才會停止。

但是，只要還有呼吸、還有時間、還有健康，就繼續寫，繼續翻譯。

我常常說：

「我們**每**一個人，**每**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時而已！

從還躺在搖籃裡的嬰兒，到家庭主婦、農夫、老師、僧人、建築師、女醫師等等，我們所有人在時間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一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時。

所以，我們應當善用時間來工作，而不應該利用別人。」

這就是我**每**天規律實踐的工作方針。

也正因如此，才有了今天這些成果。

14／釋 原 藏 法 師：

目前，承蒙已故釋慧士長老和尚的信任與託付，您肩負中央翻譯委員會主席的重任。

敬請長老說明，為什麼把佛教經典翻譯成越南語，對越南佛教未來具有如此特殊而重要的意義？

釋如典長老和尚：

在有因緣與慧士和尚深入交流以前，我已經多次與釋淨行和尚接觸。

他所主持的是將《靈山法寶大藏經》翻譯成越南語的工作。

這部大藏經是直接從《大正新脩大藏經》（Taishō Shinshū Daizōkyō）翻譯，自第一冊開始，一直到第五十四冊中段，最後形成了203冊越南語版本。

我從在澳洲多寶山區閉關的那些年開始，就非常投入地閱讀這部大藏經。

到今天為止，我已經讀完《靈山法寶大藏經》最前面的61冊，以及最後屬於史傳部和事彙的15冊。

如果是散文體，我**每**天從早到**晚**大概可以讀一百頁；如果是韻文體，**每**天大約可以讀兩百頁。

因此，我也就越來越深入、越來越沉浸在大藏經的浩瀚寶藏之中。

到了2021年，當慧士和尚正在日本治病時，他從日本打電話到德國給我，希望我能與他合作，同時負責與世界各洲聯絡。

因為他知道，我與世界許多地方都有相當密切而廣泛的聯繫。

他約定在2022年大會時成立弘法議會，而我依慧士和尚的提議，擔任總秘書。

釋元超和尚與釋本達和尚擔任副秘書。

到了第二年，在弘法大會期間，他也預知自己可能不會再住世太久，因此指定我接替他，擔任中央翻譯委員會主席，以繼續他已經規劃好的道路。

釋元超和尚擔任海外副主席，釋太和和尚擔任國內總秘書。

當我接受中央翻譯委員會主席職務時，我曾向他稟告：

「弟子不懂梵文、巴利文、西藏文等古代語言，只懂一些西方語言，例如英語、法語、德語。」

他回答我：

「法師不用擔心，那些事情會有其他人負責。」

到了2023年11月24日，當我們的弘法團正在日本姬路大南寺時，聽到他圓寂的消息。

從那一刻開始，我們所肩負的責任便更加沉重了。

在他生前，聲聞藏翻譯組已經出版24冊，以及5冊總目錄。

到了2024年他的「小祥」紀念法會時，出版組又推出了8冊。

2025年，原本預計再印4冊或6冊。

但是最後我們決定，2025年與2026年兩年的出版數量都要增加，預計再出版超過10冊，以紀念他於2026年11月圓寂周年。

翻譯組與潤文組仍然繼續工作，不過也會作一些調整，以適應當前的條件與環境。

現在越南佛教徒希望能直接以越南語閱讀佛經。

最理想的方式，是直接從梵文、巴利文、西藏文等等翻譯成越南語。

這樣，準確度就會比先經過漢文或英文，再從那些語言轉譯成越南語更高。

因為經過第二層語言轉譯，準確度自然容易下降。

而圓覺佛學院預計在2029年完成建設之後成立，也將為這項工作提供條件，培養人才，並繼續承擔未來形成菩薩藏與密藏的使命——如果我們還有因緣活到那個時候。

15／釋 原 藏 法 師：

翻譯佛典並不只是把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其中還**涉**及教義、文化，以及佛學術語的準確性。

依您之見，一位佛教經典譯者最重要的素質是什麼？

釋如典長老和尚：當然，從事翻譯工作的人首先必須精通外語，尤其必須真正掌握佛學術語。

否則，很難準確翻譯例如：

「三乘、四果、解脫僧……」

這一類佛教名相。

此外，譯者還需要經過越南國內以及海外佛學院校的正式培養，才有希望比較順利地承擔佛典翻譯工作。

例如，在越南國內，除了釋德勝和尚之外，還有釋潤珠上座、釋元賢上座、釋祝賢上座、釋元盛上座、釋元安上座、潤盛法師、潤安法師、蓮會法師等人。

潤文組方面，則有釋原藏上座、釋如秀上座，以及心光先生、心輝先生等等。

最後在排版以前負責作最終審閱的，是釋太和和尚。

一部經文、一冊經、律或論，要完成出版，其實需要經過非常多道程序。

今天我們作為讀者，只需要懷著恭敬心，把經典捧起來閱讀並依教奉行，就已經是一種非常大的福報了。

16／釋原藏法

師：面對人工智慧以及自動翻譯工具如此迅速的發展，您如何看待AI在大藏經翻譯、對勘以及數位化方面的可能性？

哪些工作可以由AI協助？

又有哪些部分，必須由學者、修行者以及僧尼親自審定？

釋如典長老和尚：就在2026年，我開始請AI（人工智慧）協助翻譯我的第75部作品，書名是：

《親鸞聖人〈教行信證〉形成的背景》。

這本書大約有150頁。

如果完全交給AI從頭翻譯到尾，大約十分鐘就可以完成。

但是之後，我卻必須花上整整十天時間重新審閱，每天工作六到八個小時。

依我的經驗，AI譯文的準確度大約只有百分之八十。

應該是人來控制AI，而不是把一切完全交託給AI。

如果過度相信AI，我們就很容易發生錯誤。

當然，如果我們下達明確指令，要求AI應該按照什麼方式翻譯，它就會按照我們的要求執行。

但是，對於《大藏經》而言，如果從漢文完全依靠AI翻譯成越南語，那麼之後負責潤文的人仍然必須耗費大量心力，仔細審查與對照。

最後幾乎就等於自己重新翻譯一遍。

因此，譯者不能在《大藏經》的翻譯工作上，完全把責任交給AI。

大約幾個月以前，在一次大藏經翻譯組的會議中，我們也曾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

但是大多數譯師都不贊成交給AI翻譯，仍然希望繼續採用傳統方式，以確保經典譯文的準確性。

至於把已經翻譯完成的經典數位化，放到網路上，類似台灣CBETA的工作，目前協調小組正在研究與討論。

如果能夠完成，這項工程將使學者和研究者在查閱、對勘以及引用佛典時更加方便。

這項工作目前正在推進之中，希望不久的將來能夠得到良好的成果。

IV／世界佛教僧伽會：六十年連結五洲僧伽

17／釋 原 藏 法

師：1991年，漢諾威圓覺寺曾經主辦世界佛教僧伽會第五屆第一次執行委員會大會，而您本人也於1993年著書記錄這次重要事件。

敬請長老回憶，是什麼樣的因緣，使您本人以及圓覺寺開始參與世界佛教僧伽會的活動？

釋如典長老和尚：大約在1989年，我經由釋禪定和尚和釋明心和尚介紹，正式成為這個組織的會員。

1989年，我參加了在台北舉行的世界佛教僧伽會第五次代表大會。

當時，漢諾威圓覺寺正在興建，原本預計於1991年舉行第一階段落成典禮。

因此，釋禪定和尚鼓勵我，應當承擔主辦世界佛教僧伽會第五屆第一次執行委員會大會的責任。

我當場就答應了。

我想，這應該是世界佛教僧伽會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在歐洲舉行會議。

當時的內部會議，由悟明長老擔任主席。

大多數華人與韓國代表都懂日語，所以我使用日語表達自己的願望，表示願意承辦這次大會。

當天會議最後決定：

第五屆第一次執行委員會大會，將於1991年4月13日至17日在漢諾威舉行。

其實，那時候寺院根本還沒有完全建好。

開幕典禮於1991年4月13日舉行。

當時，所有擔任世界佛教僧伽會會員的越南高僧大德，幾乎都前來出席。

其中包括：

釋心珠長老和尚、釋禪定長老和尚、釋玄微長老和尚、釋滿覺長老和尚、釋明心長老和尚，以及來自世界十八個國家的代表，陸續抵達參加大會。當時我接受承辦責任時，完全沒有想到，大會期間竟然正好碰上漢諾威舉辦大型Messe國際商展。

因此，圓覺寺附近所有旅館都無法租到房間。

最後，我們必須跑到Clausthal-Zellerfeld地區，才找到可以住宿的旅館。

所以，代表們每天的交通、接送以及飲食安排，一點都不簡單。

我記得，開幕典禮是在新圓覺寺的大雄寶殿舉行。

那天中午，由Berkhof佛教徒李振利的餐廳設宴供養。

晚上則由漢諾威明善李國良先生的華南餐廳設宴招待。

在參加由明光法師主持的文藝晚會之後，所有代表團再搭車回旅館。

而那間旅館離寺院有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這些都是我一生難忘的回憶。

雖然事情已經過去三十五年了，我仍然不會忘記。

此外，還有幾件重要的事情，我也想一併說明。

1991年4月13日下午，在舊圓覺寺的大雄寶殿，第一次全體會議由悟明長老主持開幕。

他以台灣華語致詞，由鄧先生翻譯成英語。

主要內容大意如下：

「感謝來自世界各地的諸位尊宿僧尼，第一次來到歐洲參加世界佛教僧伽會第五屆第一次執行委員會大會。

尤其今天，釋心珠長老也坐在這裡。

1966年，他曾與我以及覺光長老一起，在錫蘭可倫坡共同創立世界佛教僧伽會。

1969年，第二次全體大會在西貢永嚴寺舉行。

當時，阮文紹總統以及他的內閣也曾出席開幕典禮。

非常可惜的是，現在不知道那些照片到哪裡去了。

懇請釋心珠長老協助尋找，並提供給世界佛教僧伽會。」

當時，釋玄微和尚曾在印度取得佛學博士學位；釋禪定和尚是在日本取得博士學位；釋心珠和尚也都轉頭看著我，意思好像是在說：

「如典法師，你把剛才那一段英文翻譯給大會聽吧。」

這真是把我「硬抓上場」了！

除了擔任這次大會的籌備主任之外，我還得臨時兼任一個非自願的口譯員。

釋心珠和尚回答說：

「1975年，我們逃難時幾乎是死裡逃生，哪有人還能帶著那些資料？這樣吧，我再請別人幫忙找找看。」
沒想到後來，心珠長老真的請人找回了相當完整的1969年西貢第二次全體大會照片，並上傳到WBSC網站。
有心尋找的人，應該都能看到這些資料。
當時還有另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時我們每年都固定得到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內政部的財政補助。
因此，在1991年漢諾威舉行的執行委員會大會期間，德國政府也資助所有大會代表在德國境內的交通費用，同時協助負擔在漢諾威和柏林四天期間的住宿與餐飲。
正因有這樣的支持，我當時才敢承擔主辦大會的責任。
雖然那時圓覺寺仍在施工，尚未正式落成。

18／釋原藏法

師：到了2018年在馬來西亞檳城舉行的第十屆全體大會時，您受禮請擔任世界佛教僧伽會（World Buddhist Sangha Council）副主席。
您以什麼樣的心願來承擔這項國際性的重任？

釋如典長老和尚：每兩年舉行一次執行委員會大會，每四年舉行一次全體大會。
因此，從1990年以後，幾乎每一次大會我都沒有缺席。
也正因如此，各地的諸位尊宿都認識我。
每次參加大會，我都會以英語作一篇簡短發言，再翻譯成中文，向大家介紹歐洲的佛教工作。
有時候，我也會談到澳洲和美國的一些佛教活動。
因此，諸位長老慈悲關照，於2018年提議由我擔任世界佛教僧伽會副主席。
當時，由了中長老擔任主席。
到了2019年，正式任命文件在澳門公布，負責中文事務的一位副主席親自把這份證書交給我們。
世界各洲通常都有一位或兩位，有時甚至三位副主席，分別兼任弘法、教育、儀禮、文化等不同工作。
而我則負責歐洲方面的事務。
因為像釋玄微、釋禪定、釋明禮、釋明心等長老和尚都已經不在世了，所以我必須接續他們留下來的責任。

這也是一種因緣，更是一份我無法推辭的責任。

19／釋原藏法

師：經過數十年參與國際僧伽論壇，您認為南傳佛教、北傳佛教與金剛乘佛教之間，有哪些最根本的共同點，可以幫助世界僧伽超越傳統、語言與文化上的差異？

釋如典長老和尚：目前世界上有兩個大型佛教組織，匯集了許多不同的佛教傳統。

第一個是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 (WFB, 世界佛教徒聯誼會)。這個組織的總部設在泰國曼谷。

其成員包括出家眾與在家眾，同時也有許多佛教國家的國王、王儲、公主以及總理參與並給予支持。

另一個則是World Buddhist Sangha Council (WBSC, 世界佛教僧伽會)。

這個組織主要匯集來自世界四十多個國家的僧尼，依照佛陀所制定的戒律精神共同聚會。

其中包括完整的Mahāyāna (大乘)、Theravāda (南傳佛教) 以及Vajrayāna (金剛乘) 傳統。

有時候也會有一些居士參加，但並不是經常如此。

日本佛教幾乎沒有參與這個組織。

或許是因為他們認為，今天的日本佛教既不完全具有原始傳統僧團的形式，也不完全屬於在家眾。

因此，他們通常參加其他國際佛教組織。

每次舉行大會時，正式語言通常是英語與華語普通話 (Mandarin)。

如果大會是在越南、德國或其他國家舉行，通常也會增加主辦國的當地語言。

這正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來自許多國家、不同佛教傳統的高僧大德彼此見面，並共同討論環境、文化、教育、人權、和平等各種議題。

透過這些交流，世界佛教僧伽會也能針對世界上一些重要問題，發出佛教共同的聲音。

每一次大會結束後，通常都會公布一份共同宣言。

20／釋原藏法師：值此回顧世界佛教僧伽會成立與發展六十年 (1966-2026) 之際，依您之見，這個組織對世界僧伽的團結，以及弘傳正法方面，最重要的貢獻是什麼？

釋如典長老和尚：如果談到具體成果，其中之一便是台灣玄奘大學。

這所大學的成立，有世界佛教僧伽會在財力和人力方面的貢獻，其目的就是為前來求學與研究的僧尼學生，建立一個健康良好的佛教教育環境。

除此之外，世界佛教僧伽會也進行許多慈善及救濟工作，援助世界各地遭受天然災害、洪水等苦難的地區。

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在世界各地推動弘法。

那些精通外語的法師，可以前往許多國家，參加國際會議、論壇及弘法活動。這些都是非常實際的交流與學習環境，也有助於把如來的教法弘傳到不同民族與不同文化之中。

從現在開始，釋原藏上座也將在這方面積極為世界佛教僧伽會作出貢獻。

以上座弘法的經驗、使用外語的能力，以及與世界許多國家的僧尼和佛教徒所建立的廣泛交流，上座可以成為一座橋梁，連接越南佛教與國際僧伽。

尤其在今天傳播媒體與科技迅速發展的時代，透過不同方式，把世界佛教僧伽會的活動、會議與訊息傳達給廣大佛教徒，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

我希望上座繼續參加未來各屆大會，在弘法、教育以及佛教傳媒等方面提出意見，同時向五洲朋友介紹越南佛教的優良價值。

透過這樣的努力，後一代僧人便能接續前輩長老的精神，共同建立不同佛教傳統之間的和諧、團結與相互理解。

最重要的並不是職位，而是：

我們究竟能做些什麼，使正法傳播得更廣，並在今天這個時代，真正為人類帶來實際利益。

21／釋原藏法

師：今天的世界正面對戰爭、族群與宗教衝突、環境危機、不平等，以及科技過度迅速發展等問題。

依您之見，在未來幾十年中，世界佛教僧伽會應當在這些人類共同問題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釋如典長老和尚：我們佛教有兩項無比珍貴的法寶：**慈悲與智慧**。

這兩種品質具有包容、保護，以及為全人類與一切眾生帶來利益的力量。

無論是在這個世界，還是在任何其他世界，慈悲與智慧始終都是不可缺少的根本價值。

因此，世界佛教僧伽會作為一個匯集世界各種不同佛教傳統的組織，無論在任何環境之下，都應當展現這種精神：

無論面對戰爭、仇恨、階級分裂、不公義，或是人類所遭遇的各種風險與不安。

今天，無論資訊科技發展到什麼程度，一切仍然都是由人類所創造。

人類必須做科技的主人，而不應讓自己完全依賴科技。

未來幾十年，我認為世界佛教僧伽會應該更有力量地發出共同的和平之聲。

應該呼籲正在衝突的各方懂得對話、懂得傾聽，也懂得尊重彼此的生命。

佛教徒不能對因戰爭、歧視、貧窮與不公而產生的人類苦難視而不見。

同時，佛教也應該更積極地為保護環境與維護地球生命發聲。

佛陀曾經教導我們，人類與一切眾生之間存在因緣相互依存的關係。

所以，保護自然，也就是保護我們自己的生命，以及未來世代的生命。

世界佛教僧伽會也應當更加關心年輕一代的教育。

因為今天的年輕人，就是明天決定世界面貌的人。

如果只有知識與技術，卻缺乏道德、慈悲與責任，那麼所謂的進步，未必真正能為人類帶來幸福。

對於人工智慧的發展，我們不應害怕，但也不應過度依賴。

科技必須服務人類，幫助人類減少痛苦、增長理解。

科技不能取代人的良知、道德與智慧。

Theravāda、Mahāyāna與Vajrayāna三大傳統，雖然修行方法與活動形式各有不同，但是共同目標都是斷除貪、瞋、癡，發展慈悲，並引導人類走向安樂的生活。

正是這些共同點，應當由世界佛教僧伽會進一步發揚，以建立國際僧團的和諧。

如果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傳統的僧尼，能夠本著平等、尊重與理解的精神坐在一起，那麼佛教就可以為世界和平作出很大的貢獻。

僧伽本身的和合，就是向全人類傳達的一個和平訊息。

我也希望，未來世界佛教僧伽會能夠繼續擴大弘法、教育、人道救援、文化交流以及國際合作等各項計畫。

如此，佛陀的教法就不只是存在於經書之中，而能真正運用到人類的實際生活。

最後，無論世界如何變化，科學與科技發展到多麼遙遠的程度，人類始終需要一種有方向、有道德根基的心靈生活。

因此，在服務人類與弘傳正法的道路上，我們永遠都應當：

以慈悲與智慧作為走入人生的準則。

V／回顧一生修學，傳承給未來世代

22／釋原藏法師：

您已經有四十五位以上的出家弟子，其中許多人曾在歐洲、亞洲及美洲的大學接受教育。

在培養海外下一代僧尼接班人的工作中，目前最令您關心的是什麼？

釋如典長老和尚：事實上，日本教育對我的影響相當深，因為教育學正是我在大學時期所學的专业。

雖然我在日本的時間並不算長，只有五年多，從1972年2月22日至1977年4月22日，但是對我而言，那五年多卻是一片廣闊的知識天地、一股巨大的能量來源，以及在日本修行與學習歲月中所累積的無數經驗。

直到今天，我依然非常珍惜這些經驗。

除了我的出家弟子之中，已經有人在德國以及世界許多國家取得博士、碩士或大學學位之外，多年來，我還曾經照顧、資助超過兩百位僧尼學生到印度、美國、台灣、德國等地留學。

這些經費來自漢諾威圓覺寺的資助基金。

結果，單是在印度，就已經有132位取得博士學位。

至於取得碩士以及學士學位的人，也不在少數。

人們種花，是為了欣賞大自然、天地與萬物的美麗。

而我則是「種人」，為佛教培養知識與智慧。

這些成果不會消失，也沒有任何人能夠把它們奪走。

它們會隨著時間與歲月長久存在。

當我深入閱讀《大藏經》，並修持大乘佛教的一些根本經典，例如《華嚴經》、《法華經》、《大般涅槃經》、《大寶積經》、《大般若經》等等時，我只有一個願望：

希望未來的世代，從年輕的法師、師姑，到在家佛教徒，都應該開始閱讀南傳與北傳兩大傳統的《大藏經》。

如此，才能對佛教在這個世界上超過二千五百年的歷史，有一個更深、更廣、更完整的理解。

當彼此討論佛法，或登座說法時，應當依據佛經與佛陀的教法作為論據。

不要只拿自己有限、狹窄的見解，以強勢的態度壓倒別人。

這是不應該的。

我們應當依經、律、論來解釋與討論。

這些根本都存在於三藏聖教之中，而且透過許多不同語言流傳到今天。

在今日這個時代，不管身在何處、處於什麼環境，未來的年輕人都能透過越南語、英語、法語、德語、漢語、日語等等，方便地接觸這個浩瀚的佛典寶藏。

23／釋原藏法

師：您一生之中，既建寺、成立教會、培養僧尼，又弘法、著書、譯經，並參與國際佛教事務。

如果必須選擇一項工程，或一件您最希望後代繼續做下去的事情，您會選擇什麼？為什麼？

釋如典長老和尚：我只希望，在自己生命剩下的歲月裡，還能有足夠的健康、記憶力和善緣，繼續把《大藏經》讀完。

現在年紀已經接近八十歲，而我才讀了將近八十冊，算起來大約只占這座浩瀚佛典寶庫的三分之一。

想到這一點，我一方面感到歡喜，因為自己仍然有因緣繼續閱讀；另一方面也深深感受到，一個人的生命時間，與浩瀚無邊的佛法大海相比，實在太短暫了。

年紀大了以後，眼睛開始衰弱，耳朵也逐漸重聽，身體更不像年輕時那麼強健。

有些日子想多讀一些，可是體力不允許。

有些經文必須慢慢讀；有些段落必須反覆讀上好幾遍，才能逐漸體會其中深奧的義理。

然而，也正是在年老之時，經歷了人生種種起伏之後，我反而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佛陀教法的意義。

有些經句，年輕時讀過，以為自己已經明白；可是到了白髮之年，才發現當初真正理解的，其實只是一小部分。

或許正因為人生經驗、修行以及與世間種種境界的接觸，才使每一句經文逐漸變得更加親切，也更有生命力。

相反地，人在年輕的時候，有健康的身體、有明亮的雙眼、有良好的記憶力，而且前面似乎還有很多時間。

但是，大多數年輕人對無常以及時間價值的體會，尚未真正成熟。

年輕人往往認為，讀經、研究佛法，或者深入《大藏經》，可以等到明天、明年，或者年紀更大時再開始。

可是，時間從來不會停下來等待我們。

等到真正想學的時候，有時身體已經衰弱，記憶力也不像以前那麼好，而且許多其他佛事又佔據了大部分時間。

所以，我非常希望年輕的法師、師姑，以及在家佛教徒，在還有健康、還有良好條件的時候，就從現在開始。

不一定要讀得非常快，也不必替自己訂下一個過於龐大的目標。

最重要的是，真正下功夫。

每天讀一點，學一點，思惟一點，並把所學運用到自己的修行生活中。

一天讀幾頁，一個月讀一冊，一年讀幾部。

如果能夠堅持多年，那座看似無窮無盡的佛典寶藏，也會一步一步在自己眼前打開。

閱讀《大藏經》，不是為了炫耀自己已經讀了多少冊。

也不是為了增加知識，然後拿來與別人比較高下。

真正重要的是，透過閱讀，更清楚地理解佛陀的教法、佛陀制定的戒律、歷代論師的思想，以及兩千多年來歷代祖師修行證悟的經驗。

到了那個時候，學習才能真正幫助修行，而修行又反過來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經典。

如果一位出家人能夠用一生時間深入經、律、論，這也是一種報答佛恩、祖師恩以及檀那信施之恩的方法。

在家佛教徒也是一樣。

雖然不像出家人有那麼多時間，但是如果每天能夠留出一段清淨的時間，閱讀、思惟佛陀的教法，那麼自己的心靈生活一定會一天比一天更加穩固。

我只希望後代不要等到年老了才開始。

年輕時，就用青春的力量來學習；用清明的智慧來閱讀；用自己的時間來修行。

到了年老之時，再用自己一生所學、所修，照亮自己的人生。

如果能夠如此，在生命最後階段，能閱讀並深入大部分佛陀的三藏聖教，以及歷代祖師所傳承的著述，那便是一位學佛者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事情之一。因為金錢、名望、地位，最終都會隨著無常而改變。但是，透過經、律、論，透過修行與實踐正法，在我們心識中所播下的一切種子，將會成為我們在漫長心靈道路上的資糧。所以，如果還年輕、還健康、還有時間，就從今天開始。不要等到明天。

24／釋原藏法

師：在您的生平介紹中，您一直謙虛地自稱是「廣南故鄉的一個農民」。

同時，您也曾發願：

「願自己成為一條河，承載人生的一切清濁；也願成為大地，承受世間的一切潔淨與污穢。」

經過六十多年出家生活之後，今天這個誓願對您而言，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釋如典長老和尚：當然，這些行願仍然會陪伴我走完這一生。

大地不嫌棄污穢，也不嫌棄清淨。

不管任何人把什麼東西倒在土地上，土地仍然忍受、承載，默默地支撐一切，從來不抱怨。

好人走在土地上，壞人也走在土地上。

芬芳的花朵從土地生長，雜草也從土地生長。

土地不因此分別。

有人稱讚它，它不歡喜；有人踐踏它，它也不悲傷。

正是這種廣大、忍耐和包容，使我想到地藏王菩薩的行願。

地藏菩薩的行願提醒我：

學佛修行的人，要學習讓自己的心，具有如大地一般的承受力。

遇到順境，不要過分歡喜。

遇到逆境，也不要立即灰心。

別人理解自己也好，不理解自己也好；尊敬自己也好，批評自己也好。

所有這一切，都只是來了又去的因緣。

如果自己的心足夠寬廣，那些事情就無法動搖自己已經發下的大願。

水也不分別乾淨或污穢。

水流過清淨的地方可以，流過泥濘的地方也可以。

但是水的自性仍然柔和、清涼，而且具有洗淨污垢的能力。
水不與石頭爭鬥，可是經過漫長歲月，也可以把石頭磨損。
水不選擇高貴之處而捨棄低下之地；相反地，水總是往低處流。
這使我想到了觀世音菩薩的行願。
觀音之行教導我們，要懂得傾聽世間的苦難之聲。
想要救苦，首先必須懂得聆聽。
而想要真正聆聽，自己的心首先必須安靜下來。
如果內心仍然充滿成見、爭勝與分別，就很難真正聽見他人的痛苦。
可是，如果能把自己的心修習得像水一樣柔和，那麼無論遇到順緣或逆緣的人，我們仍然可以用理解與慈悲來對待。
大地教導我堪忍。
流水教導我柔和。
大地給我承受的力量。
流水給我適應的能力。
一方面堅固，卻不僵硬；另一方面柔軟，卻不軟弱。
這兩種行願彼此補充，也成為我修行道路上非常重要的兩大功課。
因此，我仍然發願學習這兩位菩薩的行願。
哪裡有眾生痛苦，哪裡就需要慈悲。
哪裡有逆境，哪裡就需要堪忍。
無論是在這個世界，還是在其他世界；無論環境順利或艱難，我都希望保持自己的心：
像大地一樣廣闊而不執著；
像流水一樣柔和，卻不失去方向。
我認為，修行人不一定要做出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才叫作行菩薩道。
有時候，只需要忍得住一句難聽的話；
原諒一個曾經傷害自己的人；
耐心傾聽一個正在受苦的人；
幫助一個正在絕望的人；
那麼，這也已經是在地藏與觀世音菩薩的道路上前進一步了。
正是從這些小事情開始，經過長久時間，才逐漸形成大願。
大願並不是在某一天發一次就完成。
它必須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每一次逆境中、每一次願意放下自我而想到別人的時候，不斷被滋養。
因此，無論我身在這個世界，還是在三千大千世界中的任何其他世界，我仍然發願永遠守護這一大願：

以地藏之行作為堪忍的力量，
以觀音之行作為傾聽的慈心，
以慈悲作為方便，
以智慧作為引路的光明。

只要還有一個眾生需要安慰，我就仍然有事情可以做。

只要還有一分痛苦需要被傾聽，慈悲心就仍然有存在的地方。

而只要還有一天能夠生活在正法之中，我便仍然發願：

繼續學習，繼續實踐，繼續為世間播下這些善良的種子。

25／釋原藏法

師：最後，如果要向散居五洲的越南青年僧尼以及佛教徒，尤其是出生、成長於海外的下一代，留下一段話，您最希望傳承什麼？

如何才能使正法以及越南佛教文化，在未來五十年乃至一百年中，繼續被保存與發展？

釋如典長老和尚：我們生活在海外，有兩項非常重要的責任。

第一項責任，是必須懂得融入自己所居住國家的社會生活、文化、教育以及宗教環境。

融入並不只是會說他們的語言，或者遵守當地法律而已。

還必須了解他們的思考方式、生活方式、責任精神以及這個社會中美好的價值。

只有了解，才能和諧生活。

只有真正融入，才能有所貢獻。

而只有作出貢獻，越南人以及越南佛教在異國的存在，才真正具有意義。

但是第二項責任，就是不能忘記自己的根源。

我們不能因為長期生活在海外，就忘記自己的文化、風俗、語言、家庭感情，以及祖父母、父母傳承給我們的心靈傳統。

因為那裡正是最初養育我們的搖籃。

它給了我們人生最初的語言、最初的搖籃曲、家庭的愛，以及做人最根本的道德價值。

我經常思考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一段提醒：

即使故鄉已經留在身後，遠離故鄉生活的人，也不要讓自己失去出生與成長之地的民族文化本質，以及宗教傳統。

這一點非常值得我們深思。

一棵樹想要把枝葉伸展得很遠，它的根就必須深深扎入土地。

遠離故鄉生活的人也是如此。

越深入融入新的社會，就越需要知道自己從哪裡來。

如果不知道自己的根源，人就很容易變成一根被從樹幹剪下來的枝條：

也許還可以暫時保持青綠，但很難把生命力繼續傳給下一代。

因此，我只希望越南人永遠不要忘記自己的母語。

無論是僧尼，還是在家佛教徒，都應如此。

語言並不只是人與人之間交談的工具。

在每一種語言之中，都蘊含著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情感以及共同記憶。

當一個孩子仍然可以使用越南語與祖父母、父母交談時，世代之間就仍然有一座橋梁。

當這座語言的橋梁消失以後，有時候感情雖然還在，但是文化與心靈深層的內涵，就很難完整地傳承下去。

對海外越南佛教徒而言，越南語又更加重要。

透過越南語，我們可以讀祖父母曾經誦過的經文；

理解父母曾經念過的偈頌；

聽到寺院鐘聲時，心中仍然會浮現故鄉；

並且能夠接觸到歷代祖師與先人，經過一代又一代傳承下來的龐大越南佛教文學寶庫。

當然，我們不能強迫年輕一代，完全按照第一代人的方式生活。

每一代都有自己的環境、生活條件與思考方式。

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播下種子。

要給孩子們學習越南語的機會；

讓他們有機會到寺院；

參加佛教家庭的活動；

聽人講述故鄉的故事；

並且讓他們明白：

自己並不是被夾在兩種文化之間，而是同時繼承了兩種文化。

如果他們能夠既成為德國、法國、美國、澳洲、加拿大，或者自己所居住任何國家的好公民；

同時又了解自己的越南根源，並保存佛教慈悲、孝敬與知恩報恩的價值；

那麼，這才是真正成功的融入。

融入，但不被同化；

向世界敞開大門，但不要把通往自己根源的大門關上。

我認為，這就是海外越南人以及越南佛教未來世代最適合走的一條道路。

至於出家人，這份責任就更加重大。

一位生活在西方的僧尼，必須懂得當地的語言與文化，才能弘法。

但是同時，也必須保存戒律、修學傳統，以及越南佛教本身美好的特色。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一方面把正法傳給當地人民；

另一方面，也替在海外出生、成長的越南子孫保存一座心靈上的橋梁。

最後，我要由衷感謝釋原藏上座提出這二十五個非常有意義的問題。

這些問題使我有機會重新回顧自己漫長的人生道路：

從廣南故鄉的一個小沙彌，到日本求學，再到德國弘法；

從初到異國、幾乎兩手空空的歲月，到圓覺寺逐步建立；

從教育、弘法、翻譯、著書、培養僧才，一直到跨越許多洲的國際佛教事務。

回顧所有這些事情，我仍然認為：

不是我一個人完成的。

而是無數因緣共同成就：

三寶之恩、師長之恩、父母之恩、教會之恩、收留自己的國家之恩、所有曾經幫助過自己的人的恩情，甚至包括那些逆緣——

正是它們幫助我在修學道路上逐漸成長。

值得記憶的事情，就把它們當作一些小小的回憶，與後來的世代分享。

仍然有所不足的地方，我也願意繼續學習、繼續改進。

如果在這些回答中，因為年老記憶有所衰退、因為個人的觀點，或者因為言語表達得不夠圓滿，而無意之間冒犯了任何團體或個人，那麼這份責任完全在我。

我至誠希望大家能夠歡喜寬恕。

到了接近八十歲的年紀，我對自己已經沒有什麼大的願求。

只希望仍然有足夠的健康，可以繼續讀經、譯書、寫下需要寫的文字，繼續完成自己還能完成的佛事，並把六十多年出家生活中所學到的一切，留給後來的世代。

人生終究都要走到終點。

寺院、書籍、名位，以及世間的一切成就，最終都會依照無常法則而改變。

真正可能留下來的，也許只是我們曾經播種在他人心中的那些善良種子。

如果有一個人，因為閱讀一頁書而多理解一分佛法；

有一個年輕人，因為得到扶持而成為佛教僧才；
有一位佛教徒，因為聽了一場法而懂得回到自己的內心；
或者有一位遠離故鄉的人，因為走進寺院，而仍然記得越南語、記得祖父母與父母，也記得自己有一個根源；
那麼，我們這一生所做的事情，也就不是毫無意義。
我只希望自己能夠一直這樣走到最後一口氣：
**以慈悲為心，
以智慧為燈，
以佛陀的教法為道路，
以利益眾生作為前進的方向。**
至誠感謝釋原藏上座，以及《弘法網站》、《圓覺網站》和《廣德網站》的所有讀者，願意花時間聆聽一位已經走過將近八十年人生的出家人的一些心聲。
南無阿彌陀佛，作大證明。

釋 原 藏 法 師：

我們謹代表《弘法網站》、《圓覺網站》與《廣德網站》的廣大讀者，至誠感恩長老慈悲歡喜，在今天的訪談中撥出寶貴時間，與我們分享您六十餘年修學與奉獻正法歷程中的種種回憶、經驗與心願。

敬願三寶洪恩加被長老：

法體輕安，

道壽綿長，

慧燈常照；

繼續成為一棵大樹，庇蔭後學；

繼續引導僧尼與佛教徒，在修學、弘法及經典翻譯的道路上前進；

並繼續為歐洲越南統一佛教教會以及世界佛教僧伽會的發展作出貢獻。

值此世界佛教僧伽會成立六十週年之際，我們敬祝世界佛教僧伽會日益莊嚴、

和合、發展；

繼續成為連結世界五洲各佛教傳統僧伽的一座橋梁；

共同奉獻正法；

把世尊慈悲、智慧與和平的訊息，傳播給全人類。

再一次，我們至誠頂禮、感恩，並敬祝長老：

法體輕安，法緣無礙。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釋 原 藏 法 師

- 《廣德網站》主編
- 澳洲墨爾本廣德寺院住持
- 越南統一佛教教會僧統院新聞出版委員會主任
- 世界佛教僧伽會弘法委員會委員